

主编 许纪霖 副主编 刘擎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in the Public Space

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 本辑主编 许纪霖

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李丁讚：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Lil Ding-tzann: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史大卫：调停、代言、压制：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地方精英

David Strand: Med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sion: Local Elites in 1920s Beijing

卜正民：家族承续性与文化霸权：1368—1911年的宁波士绅

Timothy Brook: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Gentry of Ningbo, 1368–1911

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

Elizabeth Perry: Intellectual Elites and Lower-clas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三谷博：近代日本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

Hiroshi MIT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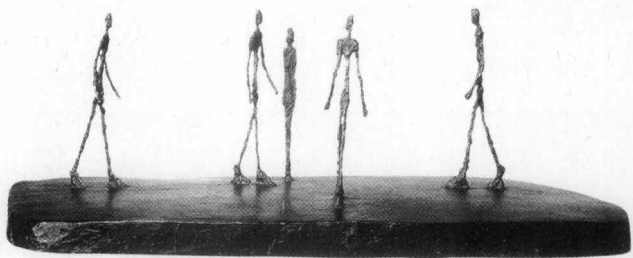
李仁渊：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

Li Renyuan: Mass Media and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Late Qing China: The Case of the South of Yangtse

方 平：自律性交往场所：清末上海公共领域的空间拓展

Fang Ping: Sites of Autonomous Communication: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Late-Qing Shangha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in
the Public Space

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 本辑主编 许纪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许纪霖主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0

(知识分子论丛, 第6辑)

ISBN 978-7-214-04525-6

I. 公... II. 许...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877 号

- 书 名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
- 主 编 许纪霖
-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刘 焱
-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 印 张 21.75
- 字 数 326 千字
-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25—6
-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

李丁讚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蔡英文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大卫(David Strand)

美国迪金森学院政治学教授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邓若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章 清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三谷博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李仁渊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博士研究生

方 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白永瑞

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科教授

王鸿泰

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知识分子论丛

第一辑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

第二辑 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

第三辑 共和、社群与公民

第四辑 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第五辑 公共性与公民观

第六辑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出版人 刘健屏

责任编辑 刘 焱 蒋卫国

封面设计 七九八文化

798 E-mail: cn798@126.com

目 录

- 1 许纪霖 导言：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Xu Jilin, Introduction: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Center: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ublic Space

Part 1 公共领域理论

- 33 查尔斯·泰勒 现代社会想象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 70 李丁讚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Lii Ding-tzann,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 91 蔡英文 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
Tsai Ying-wen,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spect for the Democratic
Consensus

Part 2 近代中国的精英转型

- 109 史大卫 调停、代言、压制：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的地方精英
David Strand, Med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sion: Local Elites in
1920s Beijing
- 129 卜正民 家族承续性与文化霸权——1368—1911 年的宁波士绅
Timothy Brook,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Gentry of Ningbo, 1368 - 1911

- 155 邓若华 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 20 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

Deng Ruohua,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Elites in the Mod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Changshu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194 裴宜理 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

Elizabeth Perry, Intellectual Elites and Lower-clas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203 章 清 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新的角色探求

Zhang Q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earch for New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Late-Qing China

Part 3 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

- 235 三谷博 近代日本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

Hiroshi MIT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Japan

- 245 李仁渊 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

Li Renyuan, Mass Media and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Late-Qing China: The Case of the South of Yangtse

- 263 方 平 自律性交往场所：清末上海公共领域的空间拓展

Fang Ping, Sites of Autonomous Communication: The Growth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Late-Qing Shanghai

- 289 白永瑞 从庆典到抵抗：五四时期天安门集会的由来

Yong-seo Baik, From Celebration to Resistance: The Origin of Tiananmen Assemblage in the May-Fourth Period

- 299 王鸿泰 青楼名妓与情艺生活：明清间的妓女与文人

Wang Hung-tai, Famed Prostitutes and Artistic Life: Whorehouse and Literati in the Ming-Qing China

导言：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

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许纪霖

在漫长的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①，他所提出的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②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

①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 年 8 月号。

②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比较有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有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3 年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①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②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

① 张颢:《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颢:《时代的探索》,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版,第43页。

②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5、8章,《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乃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之中,士大夫虽然不是世袭的贵族,具有阶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但士大夫具有法律和文化规定的各种特权和威权,是礼治社会的精英和领袖。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在这历史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把旧秩序抛离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①

读书人成为社会的游士,并非始于1905年以后,事实上,在科举废除之前,日益扩大的科举规模已经造成了大量过剩的功名人士,而洋务运动和军事地方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恰恰给这些无法向传统仕途发展的读书人——买办、商人、出版家、律师、医生、幕僚、军人等等以新的拓展空间。即使没有功名,通过这些职业,一个读书人也同样有可能通往权力的高层。报人出身的王韬、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和幕府出身的薛福成,都是成功的例子,而到了晚清,他们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了。

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晚清的知识分子游士化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②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但他们依然不

① 根据陈宝良的研究,由于明代生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而仕途依然狭窄,游士化倾向在明中叶以后就开始出现。不第秀才或者做塾师,或者当儒医,或者做幕僚,或者经商,或者成为通俗文化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第325—326、499页。

② 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三联书店(北京)2002年版,第83页。

是一般的平民,而是特殊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在这礼崩乐坏的大时代里,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①

梁任公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了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 society)。^②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差不多在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1895—1925)间发展起来。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那样,“知识人社会”的产生并非平地起楼,而是与传统的“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的“士绅社会”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③,按照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④士绅与士大夫,指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在传统中国都是享有国家功名的读书人,有着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趣味和社会地位。当说他们是士大夫时,更多指的是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官僚职能,当说他们是士绅的时候,更多指的是他们在乡村社会作为地方精英的公共职责。概而言之,汉唐

① 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页。

② intellectuals 在中国一般翻译为“知识分子”。但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分子”在中国的语境中含有贬义,“把‘人’变为‘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强烈主张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新版序第2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般概念。本文为行文的方便,在谈到 intellectuals society 时,用“知识人社会”,在谈到 intellectuals 时,用“知识分子”,两者的内涵是同样的。

③ 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正中书局(台北)1995年版,第104—106页。

④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时代的儒生们走的是往政治发展的上行路线,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从单一的上行路线转而下行,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①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瞿同祖指出:“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他们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②

宋明以后,在政治权力之外所出现的“士绅社会”,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这一社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作为“士绅社会”中的精英,士绅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社会阶层。^③他们自身通过科举、书院、讲学等方式结合成一个内部的关系网络,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垄断了古代中国的知识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礼治社会之中,文化和知识是最重要的威权来源。其二,“士绅社会”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而在明清年间,随着城市商业化的成熟,一批中上阶层的士绅移居城市,他们又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继续乡村社会的精英角色,有些研究者将由这些士绅所主导的城市生活视为中国式的“绅士管理型的公共领域”^④。其三,“士绅社会”虽

① 关于士绅威权的论述,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版,第14—19页。

②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第282—283页。

③ 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参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玛丽·兰钦:《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杨念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

然具有自主性格,在管理城乡基层社会之中也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相反地,中国的“士绅社会”与欧洲的“市民社会”不同,士绅们与国家权力有着经常性的密切互动,不仅他们的士绅身份来自国家赋予的功名,而且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性精英,在一些情况下是国家权力向基层展开的非正式的延伸,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作为乡土利益的代表,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讨价还价者。^①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随着朝廷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在清末民初年间,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一个“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传统士绅,何为现代知识分子?我们自然可以这样区分:前者有功名,基本是传统教育出身,而后者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以学校的文凭代替了科举的功名,然而,从历史的演化来说,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大致而言,晚清一代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是从士大夫到知识人过渡的一代,而到“五四”,陈独秀、胡适、鲁迅,再加上更年轻的傅斯年、顾颉刚、闻一多等,则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了——尽管作为第一代,依然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许多精神和文化遗产。^②

比较起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③张

①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326—330页。

②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演化,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载《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4年版。

③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5页。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这就是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为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① 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具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儒家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社会，传统士大夫之所以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影响，不仅因为他们是礼治秩序中的道德表率，而且还掌握了礼治背后的道德价值的解释权。这些道德价值具有超越的意义，是天的意志之体现。天德赋予人间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之正当性权威，但天之意志在中国通过“二重权威”的方式得以展现：一方面是帝国的王权作为天子秉承天意实现政治的统治，另一方面具有内在善性的心灵也有可能直接与天命相通，为天地立心。^②中国的士大夫们通过个人的心性修养所拥有的，正是那种以天理为中心的道德解释权。

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③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取代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正当性的来源，也同时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的渊源。知识的再生产，就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时代的探索》，第37—42页。

② 关于“二重权威”的论述，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联经出版公司(台北)1989年版，第45—53页。

③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从天理观到公理观的转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版，第1395—1409页；关于从规范知识到自然知识的变化，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第34—44页。

是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不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权力。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传媒和学校这两项核心资源,晚清以后其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起传统知识分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是组织化的,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这三个重要的建制性网络,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二 “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做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①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人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将之视为新式士大夫得以发挥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晚明的历史遗产。前面说过,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们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联,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②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乃是因为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

鉴于晚明士林气焰过于嚣张,清廷统治者吸取教训,严禁士大夫结社、自由讲学和民间的书院,清代的士气归于沉寂。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① 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下》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② 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群体: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涓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①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首先来看学校。中国的文化重心在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迁移。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重心在私学,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私家学校,以吸引门生。到两汉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太学,五经博士与帝国的官僚政治有着紧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贵族门阀崛起以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世族,在黑暗混乱的中世,那些世家大族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燎原火种。^②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确立,虽然科举吸引了芸芸学子,但许多有识之士痛感科举制度害人,无法培养出儒家所期望的有德性、又有经世能力的人才,他们将三代的学校理想化,并按照这样的理想开设书院。书院成为宋明时代的文化重心。然而书院再繁荣,也毕竟有限,它并没有被建制化,虽然是士大夫公共交往的网络,但并非国家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只要有科举,一般读书人就会舍书院、奔仕途而去。有清一代,书院堕落为科举的附庸,而文化世家特别是江南的文化家族成为学术文化重心。^③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才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

①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上海),2003年第2期。

② 关于魏晋时代士族与文化的关系,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78页;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关于清代的文化家族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作了很好的研究,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之中,精英是在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

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①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太学时代,还是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藉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①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